

参与性收藏的理论探析与思考

赵 莉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上海 201306)

内容提要:参与性收藏是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博物馆基于“记录今天”理念而新兴的收藏。从收藏的角度,参与性收藏是博物馆通过主题策划与活动设计,组织社会公众携相关物件加入博物馆收藏,并成为馆藏的一部分,以参与的方式将公众与博物馆物品、内容、语境联系起来,其主题多与当下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相关,方式上突破传统收藏相对单一、封闭的模式,具有流动、共享、多元、充满活力的特点。从藏品内涵上,具有“记录今天”“关注日常”“突出藏品与人的关联”等特点,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的内涵与外延,这是对传统收藏的丰富与推进。在参与性收藏的视野下,航海类博物馆收藏具有更深广的创新空间。

关键词:参与性收藏 记录今天 藏品征集 博物馆观众 藏品价值 航海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一、参与性收藏的概念与性质

201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培训中心组织的秋季培训中,欧洲文化博物馆(Museum for European Cultures)副馆长莱昂蒂娜·梅杰-范·门施(Léontine Meijer-van Mensch)女士在授课时提出了“参与性收藏”(Participation Collecting)概念。参与性收藏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博物馆基于对社会生活某一领域热点事件或正在发生变迁的关注,通过活动来发动社区、公众、民间收藏机构等向博物馆捐赠相关主题的藏品,使其成为馆藏的一部分。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博物馆(Nordiska Museet)推出的“历年圣诞节礼物收藏”、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些博物馆发起的“计算机收藏”“艾滋病人纪念拼花被收藏”等。在上述收藏中,藏品的主题都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来自城市社区、家庭、收藏基金会的人们带着他们收藏的个人物品加入博物馆,并奉献出时间、资源以及与物品相关的知识、记忆和情感,深度卷入博物馆语境,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

根据莱昂蒂娜女士的阐述,我们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理解参与性收藏的特征。时间上,参与性收藏强调的是介入当下、记录今天(docu-

menting the present),以“为未来而收藏”作为指向。在空间上,表现为博物馆日益打破其作为专业性、权威性收藏机构与社会、社区、公众及私人收藏者之间的界限,以参与的方式将公众与博物馆物品、内容、语境联系起来。前者通过记录今天、介入现实而参与了社会发展进程;后者通过收藏联系公众,扩大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程度,增强了博物馆与社会的交流、融合、共鸣与认可。因此,参与性收藏的性质是博物馆通过建构收藏参与社会发展,也是博物馆整体发展社会化、外向化的重要表征。由于参与性收藏主题多与现实社会发展、生活变迁等密切相关,因此其主要出现在西方的城市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科技博物馆以及行业性博物馆。

二、观众参与型博物馆

博物馆的诞生源于收藏。收藏是博物馆的第一要义,与博物馆发展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纵观20世纪,博物馆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20世纪初的第一次变革推动了博物馆的专业化发展,形成了关于文化遗产的权威学科;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变革侧重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产生了新的专业方向以及博物馆形态;2000年以后,全球化

收稿日期 2017-02-09

作者简介 赵莉(1979—),女,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近现代航海史。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趋势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融合,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与人们社会交往的方式,这些对博物馆产生了深远影响。较之前两次变革所形成的“专业化”、自上而下的教育权威形象,21世纪的博物馆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公众已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的角色,现实促使博物馆不断加大向社会开放的程度,参与性成为当代博物馆的显著特征。从社会学角度,21世纪以后西方社会阶层的构成变化,为博物馆的参与性特征奠定了基础。

2004年,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里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保罗·米勒(Paul Miller)在研究中提出了“职业—业余革命”(Pro-Am revolution)理论^[1]。他们认为20世纪的社会被职业化、专业化塑造,人们强调专业分工。进入21世纪后,职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职业—业余革命”,即一些并非职业从事某项工作的人们,因怀有对该事项的热情而在业余时间投入精力、参与活动,由此形成了“职业的业余者”或“业余的职业者”这样一种全新混合阶层。他们日渐成为构建社会的重要力量^[2]。对于这股构建社会的重要力量,博物馆自然要全力争取。那些对博物馆工作怀有兴趣与热情的“业余者”既是博物馆服务的对象,也成为博物馆发展日益倚重的资源和力量。除此外,近年兴起的“众包”(Crowdsourcing)理论也对博物馆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众包”指的是“公司或机构将原本由内部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去完成”^[3]。与20世纪重视专业化相比,“众包”突出的是跨专业创新中蕴藏的巨大潜力,为社会群体共同参与一项任务提供了平台,这对博物馆汲取公众智慧、驾驭群体力量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博物馆参与性的宗旨是博物馆通过活动的设计与运作,使“公众知道博物馆并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希望通过博物馆这个平台与公众发生全方位的交流”^[4]。随着博物馆与社会互动的推进,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博物馆与公众的联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观众参与到博物馆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的程度日益加深:从常态可见的展览、教育活动等博物馆“前台”逐渐拓展至“后台”,比如博物馆研究、藏品保护与修复等也成为观众非常感兴趣的内容。观众们不仅想知道博物馆是什么、有什么,而且还想知道博物馆是如何构成与运作的。正如西方博物馆学家所言,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从“告知

博物馆”转变为“展示博物馆”,“博物馆就像是个剧院,这个剧院的后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可见”^[5]。与之相呼应,参与性收藏意味着将博物馆藏品征集与收藏这道“后台”工序向公众开放。对于公众,博物馆的藏品不仅可见、可感,而且可参与、可运作、可建构,社会公众藉由收藏深度融合博物馆语境,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因此,参与性收藏不仅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建构馆藏的途径,也是博物馆响应公众需求、参与社会的主张和行动。

三、参与性收藏与传统收藏的关系

从收藏的角度,参与性收藏是以参与的方式将公众与博物馆物品、内容、语境联系起来,其主题多与当下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相关,在方式上突破了传统收藏相对单一、封闭的模式,具有流动、共享、多元、充满活力的特点。从藏品内涵上,参与性收藏具有“记录今天”“关注日常”“突出藏品与人的关联”等特点,强化藏品对于“社会行为物化”^[6]的意义,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的内涵与外延,这是对传统收藏的丰富与推进。

(一)收藏作为手段而不止于目的

无论是古典时期作为财富和地位的珍宝收藏和近代的科研收藏,还是现代意义上针对文化遗产遗存的保护性收藏,传统收藏对于博物馆核心功能的指向性非常清晰。馆藏的数量与质量、藏品影响力往往是衡量一座博物馆的重要指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博物馆收藏职能日趋成熟与完善,博物馆在公众心中是文化遗产收藏、鉴定的权威机构。参与性收藏打破了博物馆作为专业权威的收藏机构与普通公众间的界限,通过群体参与形成点对面的网状关联,衍生出收藏媒介功能。收藏媒介的意义不止于收藏某一具体的物品,而是建立一个多元互动的收藏网络,这对博物馆具有积极作用。比如,过去二三十年西方社会由于经济疲软导致一些博物馆赖以生存的无私捐赠和财政私募逐渐式微,通过面向公众开放、创建收藏网络,既丰富了收藏渠道,还有助于缓解现实条件对博物馆收藏造成的困境和冲击。同时,伴随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物质收藏过剩的现状。博物馆借助收藏网络,有针对、有目的地组织公众加入博物馆相关主题的收藏,为公众处理自身收藏提供了有意义的空间,实现了博物馆引领社会公众处理收藏的社会职责。更重要的是,收藏网络以参与的

方式将公众与博物馆的物品、内容、语境联系起来,体现了博物馆积极响应公众需求、全面参与社会的特征。

(二)时间指向未来而不止于过去

博物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收藏标准,其中“时间”是考量藏品价值的重要因素。久远、古老的物件更具有被纳入馆藏体系的价值,传统收藏也是以收藏过去的物件为主旨。正如我国近代博物馆学中的“古物”一词所传递的是博物馆对藏品“沉淀期”的倚重,一般而言,博物馆对藏品沉淀期的标准至少是五十年。参与性收藏是以“介入当下、记录今天”为主旨,突破了传统收藏对藏品“沉淀期”的限制。当下社会一些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正在进行的变革、正在消失或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传统规范以及值得纪念的现实瞬间都进入了参与性收藏范畴,凝结了上述“时刻”的物件构成参与性藏品的主体。参与性收藏的时间指向是未来,即为未来收藏今天。比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和欧洲一些收藏机构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场重大灾难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启动了由公众参与的“9·11”物件收藏活动。这些收藏机构通过网上调查问卷,向公众征询其心目中最有纪念价值的物件,并组织他们捐赠亲历这场悲剧的家人、朋友或熟人们的物品。可见,在这场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博物馆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会对事件的反应中,以收藏为“笔”及时记录这一重大事件,并通过对公众收藏的引导来发出博物馆的声音。再如,伴随科技的发展,电子产品升级换代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人们频繁地更换电子产品,与之同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面对这一现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博物馆联合收藏基金会在社区启动了诸如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收藏活动。同样,近年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城市,给城市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等带来了深刻变化,欧洲的一些城市博物馆致力于收藏反映移民与城市变迁的物件^[7]。

收藏时间指向的变化反映了当下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城市化以及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急剧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也冲击着人们的时间观念。较之农业文明时代和机械工业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时间之快与碎片化形态,记录当下的需求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迫

切。公众通过物来柔化时间,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掌控、形成自我认同是这个时代公众的文化诉求。与时代同步、通过收藏来帮助公众在转瞬即逝的时间之流中固化自我认同,也体现了博物馆的社会职责。

(三)价值突显日常而不同于精英显贵

基于参与性收藏理念对当下的关注、藏品“沉淀期”的缩短,一些凝结着日常生活痕迹的普通物件为参与性收藏所关注。与传统收藏中注重藏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相比,这类藏品可能并不伟大,但其作为“信息携带者”凸显物与人的关联,更能展现普通人的生活、触及时代变迁之核而具有收藏意义。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博物馆推出的“历年圣诞节礼物”(Christmas Gift of the Year)收藏就充分诠释了这个特征。礼物作为人与人关系的表达载体,因见证了人与人的交往、凝结情感而具有文化属性。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文化属性是其经验、常识的一部分,并非陌生体验。从该馆提供的一份历年圣诞礼物清单来看,收藏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的面包机、录像机,90年代初的CD播放机,90年代中期的网络端口、电子宠物;21世纪初的DVD播放机、电子书,以及2015年的机器人吸尘器等。这些物品属于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被纳入博物馆,不是因为“其自身物质实体的特征而被收藏,而是因其所表达、代表、体现的外在因素”^[8]。影响人们选择礼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时代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风尚品味和文化思潮等社会因素必然是其中之一。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互联网在普通人生活中的兴起、普及,赠送网络端口颇符合时尚潮流。置于时间的纵线中,礼物以私人化的物件具象地勾勒出近三十年来城市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史。社会变迁原本是宏观、抽象的,当以礼物为载体、与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关联后就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参观者,这些物件构成了一道回音壁,触动观众对自我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位置辨认,从而在物、人、社会、自我的循环中获得认同与确定。这是参与性收藏的典型案列,体现出新时代博物馆藏品价值的延伸。

(四)引领藏品中情感内涵开掘

传统收藏以收藏过去的物品为主旨、关注藏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也奠定了博物馆传统叙事的特点:侧重知识与宏观叙述。参与性收藏的时间指向与价值定位,带来了博物馆历史

表达与关怀视角的变化,呈现出从传统的宏观叙事转向社会生活史的微观切入、从博物教科书的知识输入转向故事型讲述等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藏品的情感内涵愈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苏东海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撰文讨论过博物馆物的情感论,认为情感内涵是文物重要的精神特征之一,是其最人格化的方面,值得深度开发^[9]。传统博物馆学的藏品观更注重藏品的知识层面,认为藏品“是作为显在知识的形象表现和潜在的知识载体而被收藏的”^[10]。参与性收藏侧重物与人的关联,物因凝结着人的经历,其所携带的记忆不仅是纯粹客观的事实,而且具有人格化特征,是一种烙有情感印记的物证。对于收藏者,这份情感是个人化的;但当物进入博物馆后,观众从藏品的个人化记忆中获得情感共鸣,藏品的情感面即从个体变为群体,为博物馆实现认同效应提供了基础。2016年新西兰海事博物馆(New Zealand Maritime Museum)的一个临展就讲述了1850年到20世纪60年代移民的故事,展示了移民们离开家园漂洋过海,在世界另一端开创新生活的人生历程;瑞典国立海事博物馆(Swedish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推出题为“旅行者”(The Voyagers)的展览以瑞典东印度公司为历史背景,描述了18世纪瑞典人在海上的旅行故事等。在此类展览中,诸如一张船票、一只旅行箱、一块怀表等物件伴随主人公飘洋过海的经历凝结了深厚的人文情感。所谓言之有物、物有所指,当观众被凝聚情感的物件触动了心灵,并能从他人的故事中激活自己的记忆时,就是藏品、展览乃至博物馆对观众产生意义的时刻。

四、参与性视野下航海类文物的收藏

虽然由于主题限制,以参与性收藏为主导的收藏模式不能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类型博物馆,但是该理念以构建收藏参与社会、以参与社会丰富馆藏的理念,辐射至当下博物馆的收藏创新,特别是对于一些在收藏资源、收藏主题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博物馆非常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笔者所在的博物馆主题是“航海”,馆藏征集旨在收藏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涉海记忆物证。在数千年历史中,中国人以海洋为通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与域外世界交流互动,为世界文明的交融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历史上内陆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文化主流,民族文化心理对海洋比较疏离,传统收藏中对航海文物、遗存缺

乏主动意识。与西方航海国家相比,我国传承至今的涉海历史文化遗存为数不多,加之当代航海文物的考古发掘多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因此航海收藏资源匮乏是笔者所在博物馆面临的现实。依靠调拨、系统内部的征集等政府行为远不能满足博物馆的收藏需求。参与性收藏的启示则在政府行为、市场行为之外,开掘了社会行为层面的收藏。博物馆应勇于打破博物馆与社会收藏的界限,广泛地吸纳社会收藏力量。从主题看,航海是人类以海洋为环境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能反映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物证都属于航海收藏。对博物馆而言,其社会资源因“航海”的特点而具有宽广的外延,既包括与航海、海(水)运、船舶、港口、海事制度等相关的企业、机构、组织、团体,以及与涉海直接相关的家庭与个人,还包括社会上一切对航海怀有浓厚兴趣的公众。通过与上述社会层面建立联系、集合资源,形成航海类文物的收藏网络,是征集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渠道之一。比如藏品征集部门同事们曾经积极探索在港航系统内建立文物征集特约联络员的网络工作制度,为馆藏藏品征集与博物馆宣传发挥积极作用。今后,参与性收藏还将启示工作人员以“收藏”为端口,针对诸如船长、海员、海军、渔民、造船师、船模师等涉海人群组织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动(比如针对船长的船长沙龙、针对渔民的渔俗节庆等),一方面使博物馆的收藏网络保持开放、吸纳、有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博物馆对特定的涉海人群产生归属和认同感。这对于拓展博物馆的收藏渠道、促进博物馆的社会认同都具有积极意义。

参与性收藏“记录今天、收藏当下”的特点也契合航海收藏的诉求。伴随社会演进技术进步,人类的交通方式朝着更快速、更便捷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到了21世纪,人们对速度、便捷的需求成为常态,加之社会生产方式、生态环境、政策导向等综合因素,应用于客运、捕捞作业等方面的水运、海运交通工具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有的甚至是以急剧的速度在消亡。中国航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赴太湖进行传统木帆船考察时,发现太湖地区的传统木帆船中最有代表性的七桅古渔船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太湖的保有量一直维持在100艘左右,而到了1999年时仅剩1艘^[11]。另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辽宁大连与上海之间主要交通工具的“长”字号客轮,在2000年以后由于城际

火车的开通而被取消。以船为代表的水上交通工具的消失,意味着与此相关的制造工艺、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消失。鉴于现实趋势,中国航海博物馆提出了“为未来而收藏”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持续与沿海地区的造船、港航企业保持联络,同时也积极深入沿海地区民间,及时获悉潜在的收藏线索。被拆卸的轮机、不再投入使用的船坞和码头设施、民间具有实用功能的沙船等都是征集人员密切关注的对象。征集人员曾对2013年的馆藏数量进行简单分析,发现来自社会民间的藏品数为来自文博系统内部的一倍,航海类文物收藏在社会民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此外,航海收藏还对现实中与航海相关的热点事件、人物保持敏锐关注,并征集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帆船比赛冠军徐莉佳女士的实物以及我国著名航海家郭川先生、魏军先生在环球航行时使用的器物等。参与现实也是构筑现实,记录历史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参与性视野下的航海收藏是从航海的视角及时记录时代巨变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状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下的航海事件与热点人物,从博物馆的角度普及了航海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由于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航海对于普通人是相对陌生、遥远的概念。如何在博物馆视野下建构航海与普通人的关联,这不仅是陈列展示、社会教育等“前台”业务的职责,作为博物馆各项业务的源头——收藏也应积极体现。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关注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参与性收藏“注重物与人的关联”为拉近普通人与航海的距离提供启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即藏品的内容本身能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船票、护照。这就要求征集者不断开掘航海主题与日常生活的联结点,突破老百姓头脑中技术层面的航海印象。二是方式,即构建藏品在普通人中容易接受的方式,比如故事。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ICOM第24届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当下的博物馆拥有历史,但更需要故事;较之宏观的国家史诗,博物馆更需要关注个体、反映人性的叙事,特别是日常的、普通的故事更加丰富有趣^[12]。故事能焕发藏品的生命力,也是激发普通观众对航海产生兴趣的动力。鉴于对藏品与故事关系的倚重,中国航海博物馆曾经推出针对涉海人群物品的系列收藏,比如针对海员、海军将领、船长等人物的藏品征集,通过持续展开对老海员、海军将领

(如清代著名海军名宿萨镇冰)后人的采访,将口述与实物相结合,以一手资料赋予藏品鲜活记忆,为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等后续工作提供宝贵素材,也为吸引观众走近航海奠定基础。

总之,航海博物馆作为一个专题性、行业类博物馆,其收藏的价值不能完全以综合类、艺术类博物馆的藏品标准来衡量。一根看上去普通的摇橹、一张外观并不精致的船票、一本破旧的护照等,不是因为其物理特征被纳入收藏,而是因为它们表达了特定语境中航海、社会与人的关系,又如一种即将消逝的独特工艺、一段特殊的海上旅行、第一个踏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故事等。注重藏品背后所携带的故事,从个体、日常和普通人的生活视角展开收藏,这是在博物馆视野下建构航海与观众关联的第一步,对于后续业务具有重要的引领与导向作用。

五、结语

“博物馆语境下的收藏,已不再是简单的历史遗存,而是一种文化景象,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景象”^[13]。伴随博物馆的发展,收藏体现了博物馆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古典时期,仅限于社会上层的珍品秘藏决定了博物馆的封闭性。自文艺复兴时期始,伴随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阶段的发展,博物馆逐渐步入了社会化进程,博物馆的收藏从珍品秘藏发展到对标本、器械、仪器等科学物品进行有目的、有系统的搜寻,由此形成了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职能。进入20世纪后,博物馆从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步入整体发展外向化。2000年以后,在西方一些博物馆,新兴的参与性收藏是博物馆发展整体外向化的表征。宏观上,参与性收藏通过构建收藏参与社会,将作为“后台”工序的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深化了博物馆植入社会的程度;中观上,将收藏作为媒介,打破博物馆与各类社会资源的界限,创新博物馆的收藏方式;微观上,因其“记录今天”“关注日常”“突出馆藏品与观众的关联”,丰富了当代博物馆藏品的内涵与外延。

近三十年来,伴随博物馆事业的实践以及中外博物馆界的交流互动,我国博物馆界对藏品的认识经历了从“无限制的文物标本”到“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的过程,“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日益成为国内外博物馆界的共识。但如何通过藏品与社会公众建立联系、如何引导公众超越自身局限形成对藏品乃至博物馆的深切感知,正是当下博

物馆界需要回应的具体命题。参与性收藏为这个命题发出了有力的回声。当收藏的参与性与展览、宣教、研究乃至藏品保护等博物馆业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时,这将有助于博物馆走向外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 [1] Leontine Meijer-van Mensch, Peter van Mensch. *New Trends in Museology II*. Celje: Muzej novejsje zgodovine, 2015.
- [2] 同[1]。
- [3] [美]杰夫·豪著、牛文静译:《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 [4] 沈辰:《构建博物馆:从藏品立本到公众体验》,《东南文化》2016年第5期。
- [5] [英]基德著、胡芳译:《新媒体环境中的博物馆:跨媒体、参与及伦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页。

- [6] 宋向光:《博物馆藏品的意义:社会行为的物化》,《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3期。
- [7] 上述以及下文中关于西方博物馆参与性收藏的实践案例资料均来源于莱昂蒂娜女士在国际博协培训中心2016年秋季培训的授课课件。
- [8] 宋向光:《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 [9] 苏东海:《博物馆沉思(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 [10] 同[6]。
- [11] 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太湖传统木帆船考察简报》(内部资料)。
- [12]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发言、朱洁树译:《土耳其大作家帕慕克:当务之急是让博物馆变得更小》, [EB/OL] [2018-05-18] 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712/49338627_0.shtml.
- [13] 安来顺等:《“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专家笔谈》,《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A Exploration of the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Theory

ZHAO Li

(China Maritime Museum,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is a new practice emerging in some of the western museums that addresses the idea of “documenting the present”. In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the museum organizes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contribute their own objects to the museum collection. It connects the public with museum items, contents, and contexts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s. It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s of the relatively single and closed mode of traditional collecting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sharing, diversity, and vitality. Featuring “documenting the present”, “focusing on daily life”, and “highligh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collection”,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enriches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museum collections and adds new perspectives to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llecting. With a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view, maritime museums will have more broad space for innovation in their collecting practices.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collecting; documenting the present; collection acquisition; museum audience; collection value; maritime museum

(责任编辑:黄 洋;校对:张 蕾)